



杨伯达◎著

「艺术品鉴藏大家讲坛」

图文并茂，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行文流畅，集知识性、实用性、可读性于一体，带您走进神秘的翡翠世界。

杨伯达

说

翡翠



 天津古籍出版社

杨伯达说翡翠

杨伯达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伯达说翡翠/杨伯达著.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80696-721-8

I. 杨… II. 杨… III. 玉石—研究—文集 IV.

TS933.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0507号

杨伯达说翡翠

杨伯达/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tjgjcbs@163.com

精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100千字 印数 1—3000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696-721-8

定价: 78.00元

自序

笔者为何要研究翡翠玉文化的流传问题？这有一个认识过程。举凡研究古代玉器的专家、学者，很容易专注于和田玉，不考虑其他地方产出的玉料，亦无须考虑翡翠。另外，在客观上也有一种现象降低或淡化了人们研究翡翠的兴趣和愿望，这就是古代学者很少谈及翡翠，留下的资料甚少，这增加了研究翡翠玉文化流传的难度。还有一种情况是翡翠商人和收藏家不关心、不讲究翡翠历史，甚至不惜破坏旧翡翠改造为新商品投入市场获取高额利润。所以，到现在翡翠史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无人问津，很难找到研究翡翠史的专家、学者。

笔者之所以要研究翡翠玉文化传播历史的原因，就是因为翡翠传播研究进展不畅而又不能回避。还有一个客观条件就是机遇问题，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把我引入翡翠史研究工作的门槛。1999年，中国宝玉石协会副秘书长孙凤民先生以及文孟祥先生等与企业家合作编辑出版一本综合性的中国翡翠专著，由各界学者、专家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笔者应邀出席了这次编委会，确定由本人负责翡翠史的撰稿任务，列为全书第一章。会后做了搜集资料与实物的准备，并于7月4日由文孟祥先生陪同特赴云南龙陵县考察史前硬玉斧的出土情况及其真实属性。在龙陵县文管所所长杨兴卫的协助下，将四件玉斧带到云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进行显微拉曼光谱检验，确定为蓝晶石 $[\text{Al}_2(\text{SiO}_4)\text{O}]$ ，不是翡翠。之后，去云南省博物馆，在保管部邢毅主任和王丽明的支持下，观看滇王墓出土玉器，并请“中国云南进出口珠宝玉石检测鉴定中心”进行无损检测。此后，完成所有的调查研究、搜集资料等准备工作，按照笔者的理解撰成《翡翠传播的文化背景及其社会意义》一文（2000年3月18日脱稿）。此文是本人研究翡翠玉文化传播的阶段性的整合性成果。笔者在搜寻有关古翡翠的文献和实物两方面资料时发现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是一片空白，汉至明资料均极贫乏，虽可连缀，略成体系，但不足以作为释考研究之有力证据。清代内廷翡翠的史料（如档案与藏品）尚较丰富，可补翡翠传播历史研究的阙佚，而这一任务只有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方可胜任，并向社会提供相关信息。笔者曾系统查阅《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贡档》等档案，凡以为可用者均加摘录，累计数千条。于是抽查笔录，阅览已公开发表的清代翡翠藏品，经整理研究，撰一短文《清宫旧藏翡翠器简述》，由《故宫博物院院刊》于2000年6期率先发表，这是笔者研究翡翠文化传播历史过程中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故宫翡翠藏品的关注。嗣后，在观望等待翡翠专著合作出版的过程中，为了引起学术界和翡翠收藏家对翡翠史的兴趣，先将此稿中的文献考证部分略加调整，以《从文献记载考察翡翠在中国的流传》为题，提前交《故宫博物院院刊》，于2002年第2期刊出，这是本人研究翡翠在国内流传经过的首篇专文。

不知何故，集体编写翡翠专著并公开出版的原订计划一直未能落实，随后便杳无音信，不了了之，时隔三年，仍无下文。2003年，故宫博物院筹组《故宫学刊》，便将沉睡了三年的长稿交与《学刊》编辑部，于2004年正式发表，公诸于世，为翡翠研究提供较为系统的、全面的缅甸翡翠在国内传播交流的历程，以及最终组成玉、翠两种玉材为主体的互为碰撞交织的、富有特色的双轨制玉文化的丰富内涵及其完美形式。上述三文发表后时有新资料发现，对已有资料也有了新的理解。为普及翡翠传播的历史知识，须将文献与实物再次进行整合研究，依据新发现的资料经分析提出新的解释。如：

① 指出在龙陵一带可能存在着一处以蓝晶石为原料的玉器和玉文化区；

② 吉林永吉星星哨新石器时代墓葬AM11出土两件形似扁珠的翡翠坠件，大安县渔场秦汉M206出土一件翡翠，发掘者称很可能是外来的翡翠器，可以看出翠玉文化很可能与古代日本、朝鲜半岛已有了交流；

③ 大理国两次遣使贡金装碧玕山等土产，碧玕山可能是用翡翠珠制成的山子；

④ 缅甸蒲甘王阿奴律陀获自南诏碧玉佛像可能是翡翠佛像。

经过这些新的解读，更加充实、清晰地勾勒出一个翡翠传播历程的总构架和大轮廓，并撰《勐拱翡翠流传沿革考》一文，送《中国历史文物》编辑部，正式发表于2005年第3期。至此，笔者有关翡翠玉文化传播之文稿，通过文献考证到文献与实物整合，由整合性长篇论文分别把梳解析为三稿专文公开发表，为翡翠文化流传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1982年11月，北京玉器厂接到国库秘藏四块翡翠料的设计制作任务，拟定于1986年完成雕作任务，故简称“八六工程”。我当时是北京市专家顾问团成员，有幸参加了国宝工程的艺术指导工作，长达8年之久。此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由北京玉器厂推选大师、高级工艺师等数十人担任设计、制作工作。1989年11月23日上午，以张劲夫同志为主任的鉴定验收委员会完成了“岱岳奇观”山子、“含香聚瑞”香薰、“群芳揽胜”花篮与“四海腾欢”插屏等四件当代翡翠国宝的鉴定验收工作。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唯一一次国宝翡翠工程，足见中央政府对翡翠艺术创作的关怀和厚爱。根据鉴定验收委员会建议，出版《图录》以资纪念，并将四件国宝交工艺美术馆永久保存，公开陈列展出，以飨全国人民。《图录》编辑出版工作由赵之硕馆长负责，北京玉器厂原副总工艺师兼“八六工程”总指挥董文仲大师指导，聘请专家、摄影师共同完成，于2008年正式出版发行。本人曾应邀为图录撰写《20世纪中国玉坛上的伟大创举——翡翠四宝》（本书改名为《20世纪中国翡翠四宝》）一文充作前言，使翡翠玉文化流传2000年的光辉硕果大白于天下。

近年，翡翠产业界为推动市场的繁荣、引起民间消费者的兴趣，经常举办翡翠拍卖以及翡翠作品的评比活动。笔者曾应邀参加2007年10月21日由揭阳市政府举办的中国广东揭阳市第六届国际玉器节开幕式及“翡翠论坛”活动，于当日下午在“翡翠论坛”上发表了“翡翠文化传播两千年”的演说。2008年5月8日撰成《翡翠玉文化流传两千年》一稿，尚未公开发表，此次编入本文集一并刊出。

本文集的编辑出版仅仅是我个人开展翡翠玉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同时也是翡翠玉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今后相关的科学研究工作，当然有赖于全社会有关各界的参与和努力。相信翡翠玉文化的研究工作必将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和支持，也将结出更为丰硕的成果！

拙著有关翡翠的文章共七篇，当初因单独分别发表，自具体例，各有侧重，故不必考虑七篇文章论题的重复问题。今集中成册，重复之处虽在所难免，但亦应减少到最小程度。尤其考虑到出版方将此文集定名为《杨伯达说翡翠》，在体例上应与论文集有别，故未将《从文献记载考察翡翠在中国的流传》、《勐拱翡翠流传沿革考》、《清宫旧藏翡翠器简述》三文纳入本书。

最后，对拙文清抄、打印、提供发表用的翡翠图片以及在出版过程中给予无私帮助的各位领导 and 同事致以衷心的感谢！

杨伯达

2008年12月24日脱稿

目 录

第一篇 翡翠传播的文化背景及其社会意义/1

- 一 翡翠传播的玉文化背景/5
- 二 有关翡翠的文献考析/42
- 三 翡翠溯源的实物验证/53
- 四 文献、实物的综合论证/71
- 五 翡翠迅速传播的基本动力/75
- 六 翡翠审美的历史必然/83
- 七 中国玉文化翠文化的崇高地位/85
- 八 建立翡翠美学理论是当务之急/86

第二篇 “大禹治水”与“岱岳奇观”——古今国宝的启示/91

- 一 玉材/92
- 二 设计/92
- 三 琢磨/96
- 四 艺术特色/97

第三篇 20世纪中国翡翠四宝/101

- 一 翡翠首次登上国宝圣坛/103
- 二 国家翡翠四宝工程的启动/105
- 三 一号料——“岱岳奇观”山子/109
- 四 二号料——“含香聚瑞”香熏/114
- 五 三号料——“群芳揽胜”花篮/119
- 六 四号料——“四海腾欢”插屏/124

第四篇 翡翠玉文化流传两千年/131

- 一 汉—南朝文献中的玉类翡翠/133
- 二 宋代翡翠已与皇家玉坛接轨/134
- 三 元明两代勐拱翡翠向北挺进/136
- 四 清代翡翠普及全国，身价倍涨/137
- 五 近现代民玉中的翡翠/140

附录 翡翠价值实物例证/143

编辑注：

- ①《翡翠传播的文化背景及其社会意义》曾刊载于《故宫学刊·2004年总第一辑》
- ②《“大禹治水”与“岱岳奇观”——古今国宝的启示》曾刊载于《八秩文选·杨伯达论玉》
- ③《20世纪中国玉坛上的伟大创举——翡翠四宝》曾刊载于《八秩文选·杨伯达论玉》
- ④《翡翠玉文化流传两千年》未刊

第一篇

翡翠传播的文化背景及其社会意义

内容提要

本文首次将翡翠器置于我国玉文化背景下考察其传播问题，分别从文献、实物、清宫档案等角度考察翡翠的传播经过，证实翡翠是我国玉文化的组成部分。经过检验，1988年云南龙陵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四件勐拱地区所产“硬玉斧”确系蓝晶石 $[Al_2(SiO_4)O]$ 磨制，而不是硬玉（翡翠）所制。1955年腾冲李太孺人墓出土翠镯一件，经检验确为“天然翡翠玉镯”，这是迄今所见的年代最早（1646年）的翠器物证。但经文献实物综合考证，翡翠传入中原的时间仍可定为西汉，后经历朝开发，南诏、大理的经营，明代云南永昌民众赴勐拱地区开采翡翠石料，遂由云南向江南扩散，于清雍正年间贡入内廷，继而身价渐升，超过羊脂白玉。翡翠迅速传播的基本动力是其独具的质色美，即审美上的色、水、种、地等与和田玉不同的特点。本文最后阐明了中国玉文化、翠玉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关键词：翡翠 蓝晶石 云玉 滇玉 翠生石 色 水 种 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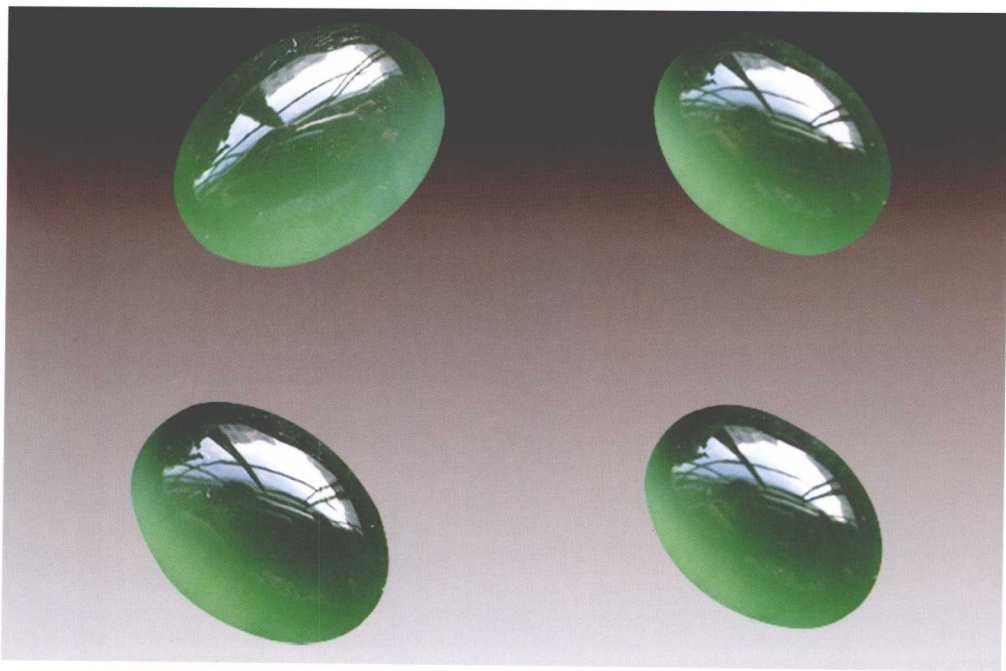


翡翠本为鸟名（图1）。《说文》释翡为“赤羽雀也”，翠为“青羽雀也”，均出郁林（今之广西）。《异物志》释：“翠鸟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其实翡翠鸟类并非仅产于广西等西南地区，江淮之地亦出之。



▲图1. 翡翠鸟

其羽毛中的红、绿二色极为艳丽，远古即用其作饰物，王室、朝廷取于江南、越南等地。民间亦用其作装饰，渐趋发展成专业化行业，用翠毛粘在片状物上以作饰品的工艺谓之“点翠”，大致唐宋古籍已有记述。此前，早于唐宋，还以翡翠比喻绿色或红色的石头，因美若翡翠，故以翡翠鸟名借之为石名，几经流传遂成了产于今缅甸的辉石玉的专名和美称（图2）。时至今日，只要一谈翡翠，大家都公认是缅甸绿玉。这种认同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最早借用翡翠鸟名定名矿物的是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据我国第一代地质矿物学者章鸿钊《石雅》考证，两赋的“翡翠”应为今缅甸所产辉石类矿物^①。此后，记述翡翠这一名称的文献是



▲图2. 翡翠玉石籽



宋欧阳修《归田录》^②。至明末《徐霞客游记》称作“翠生石”^③。清人称云南翡翠玉^④、翠石、翡翠石^⑤。清宫《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杂录档》中可见“永昌碧玉”^⑥、“云南玉”^⑦及“滇玉”^⑧等名称。永昌即今保山，古博南道要冲，至此分为南北两路，南路经龙陵、畹町；北路过腾冲、古永、盈江等地通向缅甸密支那，进入印度可到达巴基斯坦的咀义始罗（今拉瓦尔品弟附近）和阿富汗的喀布尔，进而至前苏联的木鹿（今塔什干）与西域的丝绸之路汇合。缅甸所产翡翠可直接经腾冲、过保山至大理。永昌府为缅甸翡翠输往大理、昆明以及北京等大城市的必经之路。所谓碧玉原为淡青色玉，其色青如蓝靛者为贵^⑨，清内廷称碧玉为绿色玉石（图3），产于和田与玛纳斯，与翡翠相近，属阳起石玉，不是翡翠。查保山及其所辖地区不产翡翠、玉石，以盛产红白玛瑙而闻名于世，故永昌碧玉理应为缅甸翡翠。云玉、滇玉均为清代云南玉名，今云南人仍称翡翠为玉，故其应为翡翠，实非云南所产之玉材。而东部大都市和北京等玉商和收藏家大多称云南翡翠为翡翠，也有的仍称云玉或绿玉。这种称谓中大统一、小灵活的局面在文字、口头上都维持了很长的时间，恐迄今也未达到完全一致。

至此，翡翠系鸟与玉的同名已被完全公认，而且不再因同名而产生误释。

有关翡翠流传、其自身之文化积淀以及对其观察经验之积累，均不能与对玉之记载相比。从古文献上已查到的

零星记载可知，前人对其褒贬不一，且贬多于褒，与现代有关翡翠的著述是截然不同的。这表明现代人对翡翠的认识已经改变并有所提高，其理解既深入而又有所升华。关于翡翠的矿物学含义，首先在欧洲地质矿物界通过初步检验确定并公布于世，之后，经我国矿物学界传入国内。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抢劫了大量珍宝运至欧洲，其中有不少翡翠雕件，1863年交给法国地质矿物学家德穆尔（Alexis Damour）进行检验，得出的结果是：翡翠属辉石族，主要成分为钠铝硅酸盐，化学式 $[\text{NaAl}(\text{SiO}_3)_2]$ ，硬度6—7度，超过7度的可接近石英的硬度，比重3.3。另外，还有研究者从光学性质、呈色和化学元素等方面进行了检验^⑩。



▲图3.玛纳斯绿玉



因翡翠硬度略高于和田玉，便认定和田玉为“软玉”，而将翡翠定为“硬玉”。今天看来，两者硬度因一度之差而分别定为软玉和硬玉，不仅不够严谨，而且也易被误解，这是值得重新考虑的。我国现代地质矿物教育机构和鉴定单位对众多翡翠标本作了科学检验，缅甸翡翠中不仅有辉石类翠玉，而且还包含有不少非辉石类的所谓翡翠，其内涵也是十分复杂的。这些重大的先进研究成果将在本文中加以介绍，以推动翡翠的矿物学研究。

德穆尔将中国古玉材分为和田玉和翡翠两大类，确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考察我国的玉石家庭，堪称是一个庞大的、多种类的矿物综合体，远远不止两大类，譬如绿松石、蛇纹石、水晶、玛瑙、玉髓、燧石等美石在玉石家族中不仅数量相当多，而且登上玉坛的时间也大大早于和田玉和翡翠。还有以岫岩玉、鸳鸯玉为主体的蛇纹石玉在我国玉坛上也占有一定的比重，且被利用的时间也是大大早于和田玉和翡翠。所以说德穆尔将中国玉归纳为角闪石类和辉石类是不够全面的。我国近50年来出土的史前玉器和各个历史时代的玉器都否定了德穆尔的分类，但是我们必须从另一角度来评说德穆尔分类的积极意义。德穆尔的分类法肯定了翡翠也是玉，这与我们传统的玉材观发生了冲突。譬如早于德穆尔的晚清古玉鉴赏家、鉴定家陈性，在其所撰《玉记》中称翡翠为“翠石”、“翡翠石”，在注中又加说明：“亦西方金气凝结，形虽似玉，实非真玉也。”说明陈性认为翡翠是似玉非玉

的美石。但他接着又说，“西南陬之玉……不逮西北者”，似又承认其为玉。这种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态度与提法远不及德穆尔明确、坚定。然而今天看起来，翡翠不仅是我国玉家族的成员，而且是“后起之秀”或“后来居上”的新成员，在我国现代玉坛中出色地发挥其天然的优势，在市场上占有主导地位，堪与西方的贵重宝石以试高低。可见冷眼旁观的德穆尔的观点比我国的唯和田玉马首是瞻的玉材观要科学而客观。

云南翡翠大约在清雍正年间步入宫廷，乾隆年间出现在京城市场上，之后直至今天不断在我国传播，其中间虽有短期衰退现象甚至停顿关场，但从其总趋势来看，仍然是呈现不断上升的状态，在数量上、质量上的增长都是惊人的，在市场的交易价格暴涨，反映了近几十年翡翠的价值及其文化内涵都有了空前的提高。翡翠的道路是从云南边境经过西南和东南的两条“翡翠之路”走向皇宫和京城，再波及全国，又迈入华人文化圈，最终闯入世界宝石界并争得了光辉的一席之地。

目前，翡翠出产于与我国云南省毗邻的缅甸西北部的克钦地区，其销售对象是以华人为主要目标，进而扩展到世界上的华人文化圈。于是我国的文物、矿物、工商等各界有责任向消费对象正确地解释翡翠发展的文化背景、矿物特征以及营销市场上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以推动翡翠传播沿着以“诚信为本”的健康道路继续前进。



一 翡翠传播的玉文化背景

早熟的史前玉文化
促使玉成为
中华文明的奠基石

玉文化的历史及其进程已由近50年来发掘出土的玉器所证实。出土物已将玉器加工的历史推前到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和查海文化，其代表性玉器是玉玦。玉玦是有缺口的圆形器，用于耳饰。从工艺角度观察，玦之工艺既有先进性，又有原始性，可证其并非是最早的玉器，所以中国玉器史应向前推，足有长达万年的历史。玉器是玉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玉器出现之前肯定还有一个玉石分化的漫长过程及玉石装饰、玉石崇拜的时代，这个时代可能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在玉装饰、玉崇拜的石器时代里，还用石、骨、牙作装饰。同时原始人还在不断地甄别玉与石的性能，将玉从石中筛选出来，使玉石分化开来，玉与石便在原始群体生活中各尽所能、各尽其用。

1. 玉石的分化及其三个标准

玉石分化是玉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这一切都是在原始人的有限的小环境内开展并完成的，所用的石材和玉材都出自他们生活栖息地点附近，也就是“就地取材”的玉，还不是远道输入的和田玉。

(1) 玉石分化的第一个标准——美

玉石分化必须有一定的标准作尺度，以衡量其是玉还是石。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原始的标准就是美与不美。原始人在接触石材过程中，由于玉石的色彩、质地、光泽、形状均有差异，这便促使原始人逐渐形成美与丑的两种不同的感觉，天长日久，随着观察体会所获印象逐步积累，他们渐趋认为美的石头就是玉，不美的或者是丑的石头便不是玉。这样遂从石头中分化出来不同于一般石头的玉。东汉儒家许慎所撰《说文解字》释玉“石之美，有五德……”也认为玉的第一标准就是“美”。

(2) 玉石分化的第二个标准——神物

玉的第二个标准是“神物”，也就是说玉是有神灵的物质，这反映了原始人多神论的自然神崇拜阶段的原始信仰。原始人认为山川、树木无不有神，玉石也有神，尤其对日夜晴晦、冷暖寒热这些自然现象，都以为是神的力量所支配。与之相适应的是原始巫教渐趋形成。巫就是社会上主持祭祀求得神灵祐护的神职人员。此时，玉由常人手里的装饰逐渐地向巫手中集中并渐渐为其垄断起来，可知玉的神秘化，其在史前社会的原始宗教、巫术祭祀、政治统治等上层建筑领域的地位应该很重要。总之，玉是神及神的物化象征，它具有两重性格，两种功能，促进了玉崇拜，并根据祀神的需要赋予玉以多种造型。“玉神物”要比装饰用的玉器的型饰更加复杂多样。后来，写在《周礼》上的六器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①。《周礼》



所记的六瑞^③虽为天子、贵族的身份标志，但它的原始基因可能与“玉神物”的标准有密切关系，或是由此派生出来的特别重要的社会功能。

(3) 玉石分化的第三个标准——德玉的第三个标准是“德”。

“德”本是规范人们社会生活的观念和信条，出现于西周，定型于东周。在百家争鸣的东周时期，儒家把自家的儒学主张与玉联系起来，借用玉器把儒家的深刻理念通俗化、形象化，并与君子的品格行为相联结，以玉佩系佩其身，使玉德的观念与君子的社会实践联系为一体。君子一生的起居行止都离不开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于是玉也就成为君子的化身和象征，使玉人格化，社会化，冲淡了它的神学内涵及神秘色彩。管子主张玉有九德^④，而孔子则尽情发挥，将其发展为十一德，战国及西汉的儒家大多遵循孔子的说教。孔子的玉有德的学说，是教导弟子正确理解重玉轻珉时尚时提出的：

孔子曰：“非为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诤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

《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④

十一德中除了佩、磬、圭、璋涉及玉器之外，其他八德均是由玉的物理的、化学的特性引发出来的，说明孔子等儒家哲人对玉的观察与理解是十分深刻的。此后文人爱玉、尚玉无不与孔子十一德之说有着密切关系。

上述玉的三个标准均是非矿物的、非物质的标准，而都是人文的、精神的、道德的文化标准。当然，也并非是唯一心的、主观的看法，其实都是玉的矿物属性在人们视觉感观和逻辑思维上的反映及其深层次的考辨之结论。这就是中国人对玉的传统认识，也体现出中国玉石观的民族特色。这是外国矿物学者无法理解的历史与现实，我国现代矿物学者也是不易理解的，但这确是历史土壤结出的永不凋谢的圣洁的花朵。

关于玉器的美与神的两个标准，是发生、成长于史前时代尚未出现玉神器的阶段里，大致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或新石器时代早期，截至目前尚未发现这类遗物。此后，它以玦、匕、珠、管或琮、璧、圭、璋等新的高级形式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使美与神的两个标准形体化、具象化，已发掘出土的数以万计的玉器大多都是玉的美与神的两个标准形体化、具象化的载体。

2. 东部地区三系玉文化的并存及其交流

近50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科学发掘出土的古代玉器已达数万件。从玉石角度来看，必然会引起我们对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器的特殊关注，它的一些重要情况在此略作说明。

前6000年—前2000年的玉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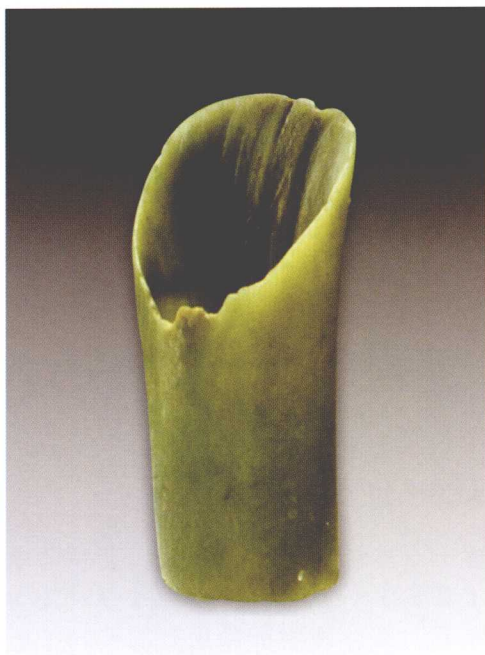


▲图4.红山文化 玉勾云形器

从其分布、功能、工艺、形饰等角度分析，大致可分为北、南、中三系。

(1) 北系玉文化

北系玉文化自距今8000余年的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始，以红山文化玉器为其盛期，分布于今东北三省、内蒙古东部、河北省北部等广袤地区。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玉器有玦、匕、珠、管、凿等，不外乎是装饰品和工具。红山文化(前4000—前3000年)玉器有勾云形佩(图4)、发箍(图5)、龙首玦(图6)、猪首云(图7)、兽首丫形器、圆孔边刃器、连体边刃器、镯、勾云形器、勾云形带齿器、头面饰三孔器、珠、管、斧以及龟、鱼、鸟、鸮等肖生玉器。不论在功能、造型、装饰上都较兴隆洼、查海玉器多姿多彩，创造了旋转性琢玉工具——原始砣机，促使



▲图5.红山文化 玉发箍



▲图6.红山文化 玉龙首玦



▲图7.红山文化 猪首云（玉勾龙）



▲图8.红山文化 玉圆孔边刃器

琢玉工艺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形成北系玉器质朴、雄伟的特殊面貌。从功能上来看，有体现物神和巫教的玉勾玉形器、猪首云（龙），有与巫术相关的鸛、鳖、鱼、蝉等动物类肖生玉雕，亦

不能排除它们是用于祛邪佑安的咒符类玉雕。勾云形器、勾云形齿饰器、龙首块、兽首丫形器等玉神器，亦可能兼有权势的首长、巫师、军事指挥员等级和职务的标志器。研究玉器的人和考古工



作者多称红山文化的圆孔边刃器为璧，如果以其与良渚文化的玉璧稍加比较，则不难判断良渚文化玉璧多为小孔，表面较平，边缘陡直，似将一种纺轮放大者。而红山文化称为“璧”的圆形器孔稍大，内外缘均磨成刃状，多不够锋利，两面均呈圆弧凸起，其断面为枣核形，往往钻有一至两个小孔以便佩系，似从圈状刃形器发展而来。它作为部落上层人物的佩系器物，同时又可兼用于切割，至少这种切割仍具有象征意义，疑其为分配权之孑遗。何况它的祖型并非规圆，除近似圆形之外，亦有不少的三角形、梯形或多边形，将其锐钝诸角都修磨成圆弧形，其祖型尚隐约可辨。这些都与良渚文化玉璧几无共同之处，所以不能称之为璧，而应称为圆孔边刃器（图8，图9）。

红山文化玉器虽然在其成器过程中仍采用治石艺手段打磨出轮廓（即其糙坯），而进入细加工时，我们从其下凹弧面及阴阳线的琢磨上观察，似已脱离治石工艺而采用原始的旋转性砣机来完成。这标志玉工艺已经完全独立，不仅有了专设的玉作坊，而且有了治玉的专用工具——原始砣机，初步完成了琢玉工艺的一次技术革命。

红山文化玉器的玉料品种可以从已公布的检测结论窥知一二。业经检验的牛河梁出土玉器38件，其中23件是“真玉”（透闪石、阳起石），半玉1件，假玉14件。检测建平出土者5件，其中4件为“真玉”，1件为“假玉”。检测阜新胡头沟出土玉器6件，其中4件为“真玉”，“半玉”、“假玉”各1件。检测翁牛特新井出土玉器1件，

是“真玉”^⑤。玉色以黄绿、深绿、淡绿、淡青为主，白色及黄色较少，其具体产地迄今仍未探明。从辽西地质构造来看，它不适于玉的生成，估计在狭小的局部地区也可能蕴藏着极少量的玉料。由于蕴藏贫乏，致使红山文化玉器的数量比较少，这也反衬出玉料来之不易。可以肯定，红山文化玉人或玉贾确实并未发现较大的玉矿。当然，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红山文化玉料是否来自辽东地区？这当然需要进一步探讨。

红山文化玉器生产中心在凌源、建平交界处，即牛河梁附近，辐射范围向北扩展到吉林省东部狭窄走廊及黑龙江省；向东以辽河为界；向西至赤峰市及哲盟两地；向南与大汶口文化玉器发生某些联系。以红山文化玉器为代表的北系玉器辐射区内的玉器均属北系玉器之列。红山文化玉器是北系玉器的典范，但其源头在何处？目前有的学者认为：黑龙江地区左家山二期文化、新开流文化出土玉器均早于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出土玉器^⑥，但重要的是发育程度仍以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出土玉器为



▲图9.红山文化 玉梯形圆孔边刃器



▲图10.河姆渡文化 玉玦

最完善，具有典型意义。

辽东及其半岛地区玉器自距今7000—5000年的史前时期出现了与红山文化玉器不同的玉文化，即新乐文化及小珠山文化等辽东玉文化。以雕刻器、斧、凿、镑为主体的玉工具和圆孔边刃牙器以及少量的珠、管等装饰品在这个地区均有所出土，其玉料都是取自附近的闪石玉和蛇纹石。玉石产于远古代辽河群大石桥组的富镁碳酸盐岩层中。矿藏在成因上属于层控变质热液交代型，含有蛇纹石玉、透闪石玉和绿泥石玉，因产于岫岩县，俗称岫岩玉。东北地区玉材古称珣玕琪^①，《周书》释为夷玉^②，也就是“东方之美者”。辽东及其半岛本为富玉区，但以玉文化的发展水平相比较，则远未达到贫玉区的红山玉文化那般高度。

（2）南系玉文化

我国东南地区玉文化的历史稍晚于北系玉文化，出现于距今7000年的余

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位于浙江宁绍地区。玉材有玉石和萤石两种，但经检验的5件出土玉器全部都是假玉，虽不能概其全，但也说明远古先民玉器制造业是建立在本区的玉石矿藏的基础上。玉器有玦（图10）、璜（图11）、管、珠、饼、丸、坠等小件佩饰，制作多不规正。值得注意的是，地处宁绍地区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相距内蒙敖汉兴隆洼、辽宁阜新查海等地甚远，其直线距离不下1000公里，未见证明相互沟通的文物出土，但南北两地古老的遗址都出土了玉玦，均以耳饰为重，这是南北两系共同的现象。

稍晚的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6000年）、崧泽文化（距今6000—5000年）分布区域位于太湖周围和杭州湾以北。马家浜文化玉器以玦（图12）、璜等小件为主。玦的数量相当多，璜有条和半璜形者，三个璜可组成一个环。崧泽文化玉器包括小件的璜、玦、环、琚、镯等，以璜（图13）